



大学经典

史通

〔唐〕刘知幾撰

〔清〕浦起龙通释

吕思勉评

李永圻 张耕华 导读整理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史 通

[唐] 刘知幾 撰 [清] 浦起龙 通释 吕思勉 评

李永圻 张耕华 导读整理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通/(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李永圻,张耕华导读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大学经典)

ISBN 978-7-5325-5026-5

I. 史... II. ①刘...②浦...③吕...④李...⑤张...

III. 史学理论—中国—唐代 IV. K09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3931号

责任编辑 谷 玉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史通

[唐]刘知幾撰 [清]浦起龙通释 吕思勉评 李永圻 张耕华 导读整理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mm 1/16

印张 30.25

插页 4

字数 535 000

版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5026-5/K·1119

定价 46.00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史 通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含“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

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

“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7年1月

导 读

李永圻 张耕华

一

刘知幾，字子玄，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享年 61 岁。刘知幾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祖父辈都能“诗礼传家”，且多是文章、吏能兼备的人才。从祖父刘胤之曾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与唐初史学名家李百药为“忘年之友”，一同参与国史和实录的编撰。从父刘延佑，少有文名，《新唐书·文艺传》称他“有吏能，治第一”。父亲刘藏器，高宗时任侍御史。其时，开国功臣尉迟敬德之子尉迟宝琳胁人为妾，藏器弹劾使之退还，尉迟宝琳私下请求高宗允其止还，凡再劾再止。于是，藏器上书皇帝，陈述大义，说：“法为天下悬衡，万民所共，陛下用舍由情，法何所施？今宝琳私请，陛下从之，臣公劾，陛下亦从之。今日从，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妇犹惮失信，况天子乎？”（《新唐书》卷二〇一《刘藏器传》）可见刘藏器是一位不畏权贵、勇于进谏的耿直官员，《全唐文》收有他“恤刑”、“刑法得失”和“往代为刑是非”对策三篇。

在《史通·自叙》篇里，刘知幾回忆起自己幼年读书时的情

形：“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以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刘知幾有两位胞兄，长兄知柔，仲兄知章，当时也由六十多岁的父亲讲授《春秋左氏传》，知幾“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又私下叹息说：“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父亲奇其志，顺其意，便“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左传》的诵读激发了刘知幾对史书的兴趣，他接着读完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到17岁时，“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大都“窥览略周”。所读的史籍，大多从亲友处借来，虽多部帙残缺，篇题有遗，然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已能粗知大约，且能“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对师说、成说颇多怀疑。刘知幾称自己“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曄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史通·自叙》）。但为了准备应试举业，青年时代的刘知幾未暇专心于史书。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刘知幾20岁，考中了进士，经吏部诠选，授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主簿。主簿为正九品小官，典领一县的文书和其他事务。身为九品小吏的刘知幾却很关心国事朝政，先后于天授二年、六年（691、695）两次上书朝廷，提出四项建议：其一是建议朝廷淘汰尸位素餐的冗官冗吏。他说：朝廷的官员已是“比肩咸是，举目皆然”，这些人既无德行，又无学识，若再“不加沙汰，臣恐有累皇风”（《唐会要》卷六七）。其二是建议“刺史非三年以上不可迁官”。他说：自秦汉以来，“方伯岳牧，临州按郡，或十年不易，或一纪仍留，莫不尽其化民之方，责以治人之术”。刺史能久任其职，

则“日就月将，风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渐百城”。今日之刺史“倏来忽往，蓬转萍流。近则累月仍迁，远则逾年必徙。将厅事为逆旅，以下车为传舍”。任职者“既怀苟且之谋，何暇循良之绩”？（《唐会要》卷六八）其三是主要针对朝廷“赦宥无度”，主张节制赦宥。其四是建议赐阶勋应以德才为重，以纠朝廷滥赐阶勋的弊病。其时正是武后临朝称制，建言上达后，武后“嘉其直”，但是不能用（《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

在获嘉任职近二十年间，仕途上升迁无望的刘知幾，在公务之暇，“恣情披阅”各类史书。获嘉地近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知幾游学京洛，饱览公私藏书，经史百家，无不涉猎。至而立之年，已能“以词学知名”，他常与徐坚（撰有《初学记》）、朱敬则（撰有《十代兴亡论》）、刘允济（撰有《鲁后春秋》，已佚）、元行冲（撰有《魏典》，已佚）、吴兢（撰有《贞观政要》）等，一起切磋学问，彼此引为知己。《旧唐书》称刘知幾及这几位知己同好，才学颀颀，识见相仿，都有“学际天人，才兼文史”的良史之才，然而“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非过使然，盖此道非趋时之具，其穷也宜哉”！（《旧唐书》卷一〇二《刘知幾传》）

武后圣历二年（699），39岁的刘知幾，调至京城任右补阙及定王府仓曹。是年，武后诏学士四十余人编《三教珠英》，刘知幾、徐彦伯、徐坚、张说等也参与其事。《三教珠英》的参编者都是学者或诗人，人称“珠英学士”。不久，一千三百卷的《三教珠英》编撰完成，同时完成的还有集“珠英学士”诗作的《珠英学士集》五卷。长安二年（702），42岁的刘知幾出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从事国史和起居注的编撰，从此开始了他的史官生涯。

早在刘知幾任史官之前，他就曾立下宏愿，要对班、马以下的各种史书“普加厘革”，像孔子修《春秋》那样，撰成一部不

刊之典，为后世史家树立楷模。“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史通·自叙》）。如今在朝廷任职史官，正可大显身手，遂其夙愿。然而，史馆的实际情况与刘知幾的理想相差甚远。朝廷为官修史书而设史馆，始于北齐，唐朝沿袭之。唐初，史馆直属于门下省，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监修者权限颇大，凡铨选编撰人员，厘定编纂原则，指导监督史官修史等无不听命于他。唐时的史馆“馆宇华丽，酒饌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史通·史官建置》）。入史馆修史，旁人都视为肥缺美差，而刘知幾却苦恼不堪，他在修史的宗旨、原则、编撰方式等问题上，他与当时史馆监修大臣武三思及其他史官多有抵牾。他感慨地说：“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齟齬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疾。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史通·自叙》）

唐长安三年（703），武后诏修唐史，刘知幾与他的几位知己好友徐坚、朱敬则、吴兢等都应诏参与编撰。次年（704），刘知幾拜凤阁舍人（中书舍人），暂罢史职。他将国史的编撰工作委托于著作郎吴兢，自己撰写了《刘氏家史》和《刘氏谱考》。武后死后，中宗即位，刘知幾再任著作郎、太子中允等职，奉令兼修国史，重修《则天实录》。仅一年，《则天实录》重修完成，朝廷对编修史官“赐物”嘉奖。刘知幾虽参与编撰，但事成之后，却因官位卑下未入受赐之列。当时史馆的“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史通·史官建置》）。他自嘲朝廷对其是“相期高于周、孔，见待下于奴仆”，“求史才则千里降迫，语宦途则十年不进”（《史

通·忤事》)。虽一再为朝廷重用，却难以实现自己的志愿。他郁悒孤愤，无以寄怀，又不甘心“寝而不言，嘿而无述”。他说：“夫人寓行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史通·史官建置》）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刘知幾决定退出史馆，向国史监修萧至忠等呈交了求退书。《史通·忤时》篇记载了这份“求退书”的主要内容及请求辞退的经过。刘知幾说：自命为史臣以来，已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史馆）”，然而“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原因在于史馆修史难以有成。他说：古时编撰国史，皆出自一家之手，都能立言不朽，藏之名山；今日史馆，是借众人之力来编撰，然而人浮于事，各自为政，“每欲记一事，载一言，阁笔相视，含毫不断”，以至于“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出自一家，体列规范科目格式，都易于统一；隶属史馆，取舍借听之监修，然监修者意见纷纷，十羊九牧，一国三公。监督者不能指授，编修者无所遵奉，结果是互相推诿，徒延年月。再者古之修史者，幽居九重，欲人不见，其意在于杜彼颜面，防诸请谒；今日史馆人多言杂，无从保密，编修者害怕得罪于“权门”、“贵族”，难以做到秉公直录，书法不隐。还有前代郡国、公府、太史、兰台等，都保留着丰富的史料，史官采集也较易，叙事也较为博；今日“此道不行”，朝廷“阙注起居”，百家“罕通行状”，史官修史不得不亲自询访，但也往往是“视听不该”，“簿籍难见”。既然著史难以有成，不如“乞已本职，还其旧居”，请避贤路。为此，他决心辞退史官，专心撰写他的《史通》。读完刘知幾的“求退书”，萧至忠颇为惭愧。他既无辞可答，“又惜其才，不许解史任”。不久，萧氏等人获罪诛杀，刘知幾则得以专心撰写他的《史通》。

《史通》的编撰始于武后长安二年（702），历时八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完成。同年，睿宗即位，刘知幾调任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依旧修国史，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其后数年，他奉诏与柳冲、徐坚、吴兢等撰《氏族系录》（二百卷）、与吴兢撰《睿宗实录》（二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等。刘氏的大半生，都处于武后当政的时期。其时，朝廷任用酷吏，滥施爵禄，所进多佞媚之徒。面对日趋败坏的政治风气，刘知幾曾撰写了一篇《思慎赋》，以古人吉凶成败的经验教训为例，告诫自己当去“驰竞之欲”，守“静退之心”，“守愚养拙，怯进勇退”，庶几可“全父母之发肤，保先人之丘墓”。小心谨慎的刘知幾在武周当政时总算没有遭受大挫折。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刘知幾因修《则天实录》之功，朝廷封其为居巢县子，这是刘知幾一生受到的最大嘉奖和荣耀。然而，好景不长。唐玄宗开元九年（721），长子刘颙以太乐令犯罪流配，知幾为之“诣执政诉理”而触犯了玄宗，被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安州府治在安陆（今湖北安陆北），离京城有好几百里。贬官的打击，再加上路途的劳顿，心绪郁闷的刘知幾到任后不久便黯然去世。敦煌本《珠英集》的残卷有刘知幾的三首佚诗，其中一首《咏史》诗云：“泛泛水中萍，离离岸傍草。逐浪高复下，从风起还倒。人生不若兹，处世安可保？……”早年写下的这几行诗句，居然一语成谶！

二

中国古代的历史著述，在汉唐间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我们读《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书目，当时并无独立的史书分类，书目中属于史书类的著述，仅《国语》、《楚汉春秋》和《太史公书》（即《史记》）等十余种。再看成书于七世纪中叶的《隋书·经籍志》，这时不仅创立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而

且著录于史部的书已达八百余种。到唐代，仅在太宗贞观初年到高宗显庆年间的三十余年里，也就是在刘知幾出生前的三十余年里，房玄龄、许敬宗、魏徵等一大批史学家已经编修完成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纪传体的前朝史，以及《高祖实录》、《太宗实录》、《贞观实录》等史书。真可谓盛世修史，盛况空前。然而，按刘知幾的史学观念来看，前人的史著虽丰，但可称为佳作的甚少，他说：“自汉以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史通·叙事》）历代编撰的史书，或是体列乖谬，或是曲笔媚主，或是“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史通·杂述》）。如何总结前人史书编撰的经验教训，为当下的史书编撰提供借鉴、树立范例，这是摆在唐初史学家面前的一项任务，而刘知幾的《史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史通》分为内篇、外篇，各十卷。内篇 39 篇，外篇 13 篇，共 52 篇。内篇中的《体统》、《纪传》、《弛张》三篇早已亡佚，故现存仅 49 篇。《史通》是一部史学通论性的著述，其论述的范围，几乎与今日的“史学概论”相当，诸如治史宗旨、史家修养、史学方法、史书体例、历代修史得失等，多有专篇的论述，但其论述的核心，一是集中在史学的功能和史家的职责，一是集中在史书的体例与编撰方法。

刘知幾论史学，特别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他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曲笔》）又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直书》）他坚信史书的记事载言，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史学的宗旨在此，史家的职责也在此。由此为基础，刘知幾为史学家列出了三项任务和职责：“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这是

第一项任务和职责：“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这是第二项任务和职责：“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这是第三项任务和职责（《史通·辨职》）。这三项任务和职责，刘知幾最看重的是第一项，所以，他也把“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视为史家第一等的素质。

据《旧唐书》所载：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刘知幾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知幾回答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枘柄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这就是著名的“史家三长说”。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说，时人以为知言。唐代学者论治史，多强调史家记事当善恶必书，并把它与史家的才学、人品和德行相联系。刘知幾的知己好友刘允济也有一段常为后人引用的论述，他说：“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史官》）可见当年怀有与刘知幾同样思想的学者不在少数。《史通》一书虽没有专门叙述“史家三长”，但书中各篇的论述，实在都是对“三长说”的具体阐述。《载文》、《叙事》、《核才》、《点烦》等篇，都是论述史书写作方法和语言技巧的，大致属于“史才”范围。《杂述》、《采撰》等篇，强调史家要“博闻旧事，多识其物”，不光是“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还要“择其善者而从之”，都是论述史家要有丰富的知识，要能广采众说，博学多闻，大致属于“史学”的范围。“三长说”的“史识”，主要是指史家的见解、观点和秉笔直书、忠于事实的品质。这在《史通》的《曲笔》、《直书》、《惑经》等篇中论述得最详细。

《史通》论史书的编撰，最看重实录，贵“直书”，斥“曲笔”，强调史家记事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惑经》），这是史家天职。“苟违斯法，岂曰能官”（《曲笔》）？按刘知幾的标准，做不到书法不隐，善恶必书，就谈不上良史，也不配担当史官之职。他特别赞赏历史上崇尚气节，刚正不屈的史学家，称赞他们“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直书》）。谴责那些曲笔隐讳，甚至借撰史而窃取财物官位的史官，说他们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史通·曲笔》）他对历代因直书而被害的史家愤愤不平，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君”，司马迁书西汉君主之过，韦昭在吴国主持正义，崔浩在北魏直书犯忌。他们“或身膏斧钺，取笑于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于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史通·直书》）。何以能既不屈辱史职，又保全身家性命？此“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字里行间透露出知幾心中的些许无奈。

清章学诚曾说他与刘知幾的区别：是“刘言史法，吾言史意”。章氏所说的“史法”，就是史书编撰上的体裁、体例问题。《史通》论治史，确是特别关注体例和编撰的方法问题。刘知幾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序例》）他论纪传体裁：“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这是它的长处。但“同为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此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是为它的短处。他论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

尽一言，语无重出。”这是它的长处。但“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山丘弃”，这是它的短处。他认为，纪传编年的优缺点，是体裁本身所造成，非关史家的才能学识，当“各有其美，并行于世”（《二体》）。有关史书的体例和编撰方法问题的论述，几乎占了《史通》一半以上的篇幅。如《六家》、《二体》分析唐以前史书体裁的渊源流变，《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等篇论史书记传、表、志诸体的得失，《言语》、《叙事》论史书文辞和叙事上的要求，《序例》、《编次》、《题目》、《断限》论史书的题目、序、体例以及材料的编排组织。《载言》篇论史书记言、记事的区别，《载文》论文与史的不同，《补注》论史注，《书事》、《人物》论史事人物的取舍。《辨职》、《史馆建置》等篇论史馆设置的沿革和史馆修史的弊端等。

刘知幾反对文人修史，他认为文与史“较然异辙”（《核才》），世人看重文采，崇尚浮丽，写史者追求词藻之华丽，文句之对偶，结果是“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这样的史书“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令人不信”（《载文》）。这当然不是说史家修史不要讲究文采。他在《史通·叙事》篇中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敝。”所以，编撰史书一定要讲究叙事，好的史家也一定要善于叙事。何谓善于叙事呢？他提出的标准有三：一是简要，二是隐晦，三是质朴。简要“文约而事丰”，隐晦是言简而意赅，质朴是清晰明白，不滥加修饰，浓墨雕采。

《史通》成书之后，刘知幾的知己好友徐坚读之，大为赞叹，说是书“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铭也”（《新唐书·刘子玄传》），但时人都不以为然，“见者亦互言其短”。他自知自己的史学见解，不为时人所理解，又顾虑《史通》因无识者而将湮